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6.007

温特森《正常就好,何必快乐》的空间解读

王桃花,罗海燕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珍妮特·温特森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是反映女性生存困境的现实力作,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快乐”与“正常”为何在温特森的人生中不可兼得?空间解读可以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家这一“表征空间”再现了温特森的童年创伤记忆;教会与学校性别教育反映了父权社会“空间表征”对女性的规训和压迫。温特森因此进行了挑战性的“空间实践”,为女性打破父权社会秩序、突破“空间表征”制约、唤醒女性主体意识指明了救赎之道。

关键词:《正常就好,何必快乐》;女性生存困境;表征空间;空间表征;空间实践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0)06-0049-07

英国当代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1959-)于2011年发表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早在1985年,温特森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中已经记述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因此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好奇。已有研究多从创伤叙事、女性主义、叙事时间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阐释,而以空间为切入点的研究并不多。梅里亚·马基宁(Merja Makinen)注意到温特森的小说走向了一个空间^①,但她并没有解读温特森这部回忆录中的空间。雷纳·威尔(Reina Wiel)认为,温特森很可能是出于“公众对她个人生活的迷恋”才创作了该回忆录^②。艾玛·麦肯纳(Emma McKenna)则指出,温特森在该回忆录中将女性主义和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意在通过叙事治愈自己的创伤,开辟一个没有虐待、暴力和忽视的空间^③。麦肯纳提到了小说中空间、创伤、女性之间的关系,但未进行深入探讨,

也没有考察空间对于阐释女性生存困境主题的隐喻功能。《正常就好,何必快乐》讲述了温特森因执着追求爱情而被人认为“不正常”的人生历程,反映了女性的生存困境。那么,温特森为何宁愿付出“不正常”的代价也要追求快乐,以上评论均未对小说通过空间展现的女性生存困境进行探究。本文旨在把握小说中空间的独特作用,结合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三一论”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解读小说中情感缺失的“表征空间”、规训女性的“空间表征”以及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揭示当代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为打破父权社会秩序、突破“空间表征”制约、唤醒女性主体意识指明救赎之道。

一 家:情感缺失的“表征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表征空间”属于生活空间(lived space),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这是一个被支配的、被动体验的空间,包含行动和生活环境的场所^④。个体的“表征空间”可以表达个

收稿日期:2020-03-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WW067);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XSP18YBZ109)

作者简介:王桃花(1975-),女,湖南隆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当代文学研究。

①Makinen, Merja. *The Novels of Jeanette Winters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6.

②Wiel, Reina. *Literary Aesthetics of Trauma: Virginia Woolf and Jeanette Winters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76.

③McKenna, Emma. “Double Melancholy: The (Class) Politics of Loss in Jeanette Winterson’s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2016, 27 (3): 296-316.

④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39-46.

体的精神追求和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①。在这部回忆录中,温特森所在之家可以被视为缺乏温情的“表征空间”,是性别主义的一种表征。

《正常就好,何必快乐》开篇以“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②拉开了以空间书写性别政治的帷幕。温特森是被领养的女孩,她经常被锁在门外或关进煤库。她把领养看做是一场海难,她被遗弃在人类的海岸,“发现这里缺乏人情温暖,也少有善意”。她在领养家庭中并不受欢迎,其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原因在于养母(温特森太太)不尊重温特森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父权社会的支配下,养母准备领养一个男孩,结果却阴差阳错收养了温特森。温特森从小生活在缺乏温暖的“表征空间”——“家”之中,接受养母严厉的教导,被迫顺应女性世界。

关于家的作用,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 1964)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区分了可以给人带来幸福的“家宅”(home)以及仅仅作为建筑物的“住宅”(house)。家不仅是一个“对象”,更是人们获得保护和支持的地方。“没有家,人将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存在。家使人在自然和人生的风暴中得以生存。”^③外面的天气无比恶劣之时,家像“母亲”一样具有人性之美,是“一个可以给人安慰的空间,是用来凝聚和捍卫亲密关系的空间”^④。人只有首先获得“家宅”的庇护、家人的支持才可以远离孤独感和疏离感。然而在温特森看来,在收养她的家庭里,“好像把孩子整夜关在门外很正常,从不和丈夫同床也很正常……在放抹布的抽屉里藏一把左轮手枪也很正常”。为了获得自由空间,温特森不得不离家出走。“日常生活也存在于表征空间中”^⑤,家本该是一个温馨而充满爱意的空间,是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地方,可温特森所在之家却是一个情感缺失的空间,也构成了温特森的创伤记忆。雷纳·威尔指出,

“温特森最近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将她的领养看作是一个原始的创伤”^⑥。悲观而强势的养母和家中冷漠缺爱的环境使温特森难以过上常人的生活,也导致了她在精神上的异化。温特森在家中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家成为温特森“被动体验的、受控的空间”^⑦。在迈克·克朗看来,家可以被看作是安全同时又受限制的地方^⑧。温特森从小被信奉五旬节教派的父母收养,养母极度不热爱生活且异常悲观,她认为“宇宙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而且是关着的垃圾桶。在养母看来,“生命是一种负担……是一种临终前的体验”。养母的控制欲很强,她在家时刻监视着温特森的一举一动,确保掌握温特森的一切动静,这使温特森毫无私密空间可言。“温特森太太从不尊重我的隐私。她翻遍我所有的东西,看我的日记、笔记本、故事和信件。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安全感。”温特森所在之家俨然成为情感缺失的“表征空间”,她和养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波伏娃曾讨论过母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⑨。温特森的养母是理性的化身,她牢牢掌握主控权,不允许温特森偏离她为之规划好的人生路线。她希望温特森成为一名布道者,而不是像其他女性一样正常结婚生子。养母对宗教的狂热导致温特森在家中成为受虐者,她在温特森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和虐待欲。温特森描述了母女之间的相处模式,“她总是把我击垮,然后做个蛋糕和我重归于好”。养母的这种行为模式给温特森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在她以后的成长中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试图远离她抑郁的黑暗轨道。我试图走出她投下的阴影。我并非真要去哪里,我只是想走开,走向自由,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永远都带着阴影。”这样的家庭环境使温

①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39-40.

②Winterson, Jeanette.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1, p.1.(译文参考了《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冯倩珠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部分译文略有改动。以下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③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New York: The Orion Press, 1964, pp.6-7.

④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New York: The Orion Press, 1964, p.48.

⑤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116.

⑥Wiel, Reina. *Literary Aesthetics of Trauma: Virginia Woolf and Jeanette Winters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21.

⑦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39.

⑧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特森的性格变得异常。“当家宅中总是充满不幸的往事、漂浮着痛苦的记忆的时候,它往往也会变成腐蚀心灵、囚禁梦想、扭曲性格的枷锁。”^①温特森自小渴望得到养父母的爱与认可,然而她感慨道,“我没有获得父母无条件的爱,我是个很紧张、警惕的孩子。我也是个小暴徒,因为没有人能将我打倒或看到我哭泣”。温特森的童年极度缺乏父母的爱与关怀,这导致她性格孤僻、性情暴躁,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成年后她依然如此。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一个缺乏父母之爱的孩子,可能在令人惊讶的小小年纪里便对生与死、人类的命运沉思默想,而且试图从一种哲学或神学中寻求虚假的安慰^②。缺爱的家庭给温特森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她从书里面阅读寻爱的故事,希望可以从中获得安慰,“因为故事里全是渴望与得不到回应的爱”。正因为家庭环境让温特森如此缺爱,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年长的女孩,选择了不同于常人的性取向。

温特森所在之家变成了她自我封闭的“表征空间”,表征着她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她不希望像养母那样终身固定在主妇的角色上,异化成为仆人,变成悲观而消极的象征。温特森逃离家这个缺乏温情的地方,转向其他空间寻求身份认同感,然而教会和学校校规所构想的“空间表征”旨在规训女性,强调男尊女卑,把女性排斥在社会空间之外,因而留给她的无处安放的生活和更加激烈的生存冲突。

二 教会、学校性别教育:规训女性的“空间表征”

列斐伏尔结合社会、历史、性别等诸多因素,认为“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及其施行的‘秩序’有关,因此与知识、符号、代码等相关联”^③,空间表征结合了意识形态和知识^④,因而是主流社会或强势群体所构想的主导空间秩序。列斐伏尔还提出,“权力遍布于空间……权力已然将其领域扩

展到了每一个人的骨髓之中,扩展到了意识的根源,扩展到了隐匿在主体性的褶皱下的‘特殊空间’里”^⑤。可以看出,“空间表征”是概念化的空间。在空间领域,列斐伏尔的权力概念无处不在,通过空间渗透到人们的身体和精神领域。由于空间表征是支配性的,温特森通过对教会和学校的描写体现了宗教信条与性别教育对女性的规训,揭示了以教会和学校为代表的父权社会构想的“空间表征”对女性产生的影响。

温特森通过描写教会揭露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群体实现其权力空间化的意图。教会禁止温特森同性恋的行为强化书写了男性的空间表征,规训了空间秩序,操控着父权等级社会的空间表征,女性压迫得以实现。温特森不仅无法在教堂这一“神圣”空间获得人们的认同,而且必须压制身体的欲望,因为教会有很多“残忍的教条和令人痛苦的苛禁:禁酒、禁烟、禁止性行为、禁止看电影、禁止跳舞”。教会是温特森的“失乐园”——精神失落的空间。温特森打破纯粹时间的顺序,用空间的形式叙述自己的故事。在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看来,“‘纯粹时间’根本就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⑥。温特森旨在通过教会的描写让读者体验她失去精神家园的感受,教会不是她的精神归宿,反而促使她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越来越远。

教会是主流社会主导空间秩序的工具、施展权威的场所。福柯分析了权力在空间中运作的情形,他认为权力分布在整个社会,“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⑦。空间的划分使得权力更加增强,空间是权力进行运作的基础,“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⑧。空间是一种“手段”“工具”“媒介”,它是“每个人”手中持有的工具,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⑨。教会尤其是彰显宗教权威、进行权力运作的场所,人们的言

①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8页。

②伯特兰·罗素:《走向幸福:罗素精品集》,王雨、陈基发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③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33.

④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45.

⑤E. W. 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⑥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⑦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⑧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页。

⑨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

谈举止、举手投足都要刻上规训的烙印。通过传播教义、控制和麻醉人们的思想,教会使人威慑于宗教神权之下,甘愿做一个顺从的上帝子民。

教会通过空间规训实现对女性的压迫。空间规训首先体现为等级社会空间秩序的形成,通常由强势群体书写“空间表征”,规训空间秩序^①。在教会做祷告时,温特森被当众告知她犯了可憎的罪——她的同性恋倾向是违反教规的,她被认为是魔鬼附身,养母把她锁在窗帘紧闭的客厅关了三天,断水断食以驱赶所谓附身的魔鬼,“单独囚禁能够使人反省,随后肯定会产生悔恨。因此单独囚禁是一种积极的改造手段”^②。这个狭窄的空间禁锢了温特森的身体自由。林少晶在分析温特森在权力下的生存空间时强调:“身体是最小的空间单位,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何种权力也就意味着对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拥有多少话语权。”^③观察身体在空间中的境遇,可以发现,温特森被封闭在一个备受压抑、丝毫没有发言权的空间。教会的话语是一种“规范”,母亲通常被教会号召和鼓励去维护这一“规范”。养母告发了温特森的同性恋行为,这是教会长期规训女性的肉体 and 心灵以达到的统治效果。

温特森描述了自己在教会处于被凝视位置的情形,她被置于父权空间表征话语下的教会空间里,受到男性的凝视和审查。温特森的同性恋行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众人指责的目光中,在被教友殴打的耻辱中,温特森彻底感觉自己是一个被人凝视的客体。林少晶认为:“空间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永远处于权力网中而无法置身事外,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④由于温特森不同的性取向,她在教堂被当做另类供人们观看,是被凝视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单纯的欲望客体,“他们轮番为我祈祷……因为我仍然固执己见,一位老教友不断地殴打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竟然想趁火打劫,温特森受到了其中一名教友的凌辱,“他把舌头伸进我嘴里。我咬了它。鲜血。很多血。一片昏黑”。温特森揭露了人性的欲望和丑陋,讽刺了

教会的虚伪,揭示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教会对女性的压迫。可见,“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因此对身体的控制压迫也总是始于空间”^⑤。

学校也是规训和歧视女性的空间,学校的性别教育被父权社会的制度和法则所侵蚀。置身于男尊女卑空间表征下的社会空间里,温特森的日常工作受到学校各种制度的规训。在学校里,女性被教导要学会顺从,要认同男性在社会中的支配权。学校是权力对个人进行规训的场地^⑥。温特森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学校的唯一性教育课,根本不是关于性的,而是关于性别经济学。我们应该自己付钱,因为这是现代的做法,但我们应该事先把钱给男生,这样别人就可以看到是他付的钱……老师把这称作‘男性尊严’。”学校除了传播父权制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性别歧视和偏见也随处可见。在牛津大学,导师刻意贬低女性,不但不给予任何指导,还对女生冷嘲热讽,他嘲笑温特森是“工人阶级的试验”,黑人女学生是“黑人的试验”。学校的课程设置对女性也有偏见,有了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沃尔夫就不必列入教学大纲,“有关女性方面,牛津不是沉默的同谋,而是无知的同谋”。学校刻意忽视女性意识教育,让女性认为自己无足轻重。温特森受到学校的不断规训和歧视之后,她精神极度痛苦,逐渐被异化。在学校里温特森格格不入,自我封闭十分严重。她经常感到失落、恐惧和无助,“我是个糟糕的学生,松散又难管,年复一年成绩不佳。我无法集中精神,也不太明白别人对我说的话”。有时她通过身体暴力来发泄情绪,她和同学之间的打闹事实上是对学校规训的一种反抗,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孩应该性格内向、安静、不吵闹,而温特森却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女孩。温特森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不正常,但她说:“要正常很难”,因为“空间是控制和监视个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场战斗”^⑦。

教会和学校性别教育是被构想出来的“空间表征”,旨在规训女性,限制女性身体自由和言论

①赵莉华,石坚:《〈宠儿〉中的“空间表征”之争》,《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

②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③林少晶:《温特森的真实空间:权力下的生存空间》,《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④林少晶:《温特森的真实空间:权力下的生存空间》,《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⑤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⑥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3页。

⑦Crampton, Jeremy W., Stuart Elden.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p.2.

自由,配合男权欲望,强调男尊女卑,使女性在社会空间被边缘化。“空间表征”的形成过程体现了男性作为强势群体对女性的强大控制力,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他们书写了父权社会的“空间表征”,规训着空间秩序。这折射出女性的艰难生存困境。在教会和学校,男性统治通过象征性的暴力来实现,女性不知不觉地接受男性统治以隐秘的形式在教会和学校存在,而且女性沉浸在这样的象征符号中,不断被迫接受和内化这种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思想,并按照这种观念去思考。鉴于此,温特森试图通过“空间实践”来反抗教会的压迫和学校的规训。

三 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

根据列斐伏尔“空间三一论”,“表征空间”的居住者在“空间表征”的渗透和制约之下,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空间实践”行为,即“顺应型的空间实践”和“挑战型的空间实践”^①。受空间表征的影响,有些女性内化了社会空间表征,其空间实践行为完全服从空间表征,而有些女性则意识到社会空间秩序的虚构性以及社会构建性,因此,她们试图通过采取不同策略对这种既定的空间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温特森的“空间实践”是挑战型的,她有意突破“空间表征”的制约、打破父权社会的秩序、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

温特森在发现教会的虚伪之后,她开始挑战宗教的权威。在遭到教友的殴打和侵犯时,温特森愤怒地反抗,“我说没有魔鬼。我说我爱海伦……我母亲不愿跟我父亲同床——这是正常的性关系吗?”面对暴力,温特森奋力和他们辩驳,实际上是希望争取女同性恋话语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②。因为争夺话语权就是争夺权力,通过控制话语权,女性可以争夺权力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尽管遭到男权社会的否定和干涉,温特森依然突破教义束缚,继续坚持自己的爱情观念,甚至经历痛苦也在所不惜。温特森不愿

意放弃自己的命运,她主张女性有追求幸福的主体性权力。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教会压迫了女性的自由选择,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女性没有话语权。温特森挑战男性权威并希望树立女性话语权威,她反叛教会的规则,颠覆父权话语充斥的“空间表征”。

为了摆脱被规训的命运,温特森毅然决定脱离教会,继续坚持不被人认可的爱情。违背教义和违反禁忌的同性恋行为——这种挑战是温特森为了证明女性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事实上,波伏娃指出,“对于女人来说,同性恋可以是她逃避自己处境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接受这种处境的一种方式”^③。卡尔·白舍客(Karl H. Peschke)进一步强调:“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④此外,伯特兰·罗素在谈论同性恋现象时,提倡人们持一种宽容的态度^⑤。可对教会而言,温特森的同性恋倾向是一种“反常”行为,必须得到纠正,异性恋才符合教义。温特森对教义的违背挑战了父权制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标准,暗示女性追求自由人生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借此她批判了教会对女性的精神压迫、扭曲和摧残。温特森揭开了教会的虚假面目,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为受压迫的女性发声,“展现人类新的自我与心路历程”^⑥。

温特森揭露了教会的黑暗和腐朽,教会已成为有些牧师谋取利益的手段。早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温特森就披露了养母信教的原因:加入教会可以获得盆栽,为了可以多拿一个,养母让丈夫也入教,可惜去的时间迟盆栽已被领完。这说明人们加入教会的动机不纯正,自然也不会有坚定的信仰。盆栽是教会的一种吸引策略,牧师以传教为名为自己谋取利益,温特森称这个教会为“迷途人协会”(Society of the Lost)。牧师把教会当成了自己谋生、谋利的手段,教会也因牧师贪污而被解散,“协会已经解散了……为渔民筹集的大部分善款被用作偿还他(牧师)的赌债”^⑦。这说明教会的堕落和腐化,这里已不再是人们的

①李晓云:《“空间三一论”视阈下女性空间实践解读》,《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②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③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④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静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0页。

⑤伯特兰·罗素:《走向幸福:罗素精品集》,王雨、陈基发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⑥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⑦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于是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精神家园,尽管表面上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和愿望。

除了挑战教会的权威,温特森在学校的叛逆表现也是她的挑战型“空间实践”。“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恐怖主义统治权力机制是可以反抗的,是有通往自由光明的出口的。”^①尽管学校规训的权力无比强大,但也并非万能。监狱式的学校无法消除一切反抗,温特森和她的女性朋友们质疑和挑战学校所构建的“空间表征”,她们“成立了自己的阅读小组……撇开性别歧视、势力、父权态度……满怀激情地阅读、思考、认知、讨论”。

通过阅读构建女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温特森的挑战型“空间实践”。列斐伏尔的学生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观点,在塞托看来,“阅读行为是特定场所的实践所产生的空间:书面文本,即由符号系统构成的场所”^②。阅读是温特森真正的庇护空间,她可以暂时逃避一切,就像毛姆所言:“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建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③温特森通过阅读了解自我、修复创伤,构建宁静的心灵之家,“对我来说,书是一个家……里面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书里有温暖,有壁炉。我坐下来看书,便暖和了”。阅读是一个开放、具有广阔天地的场所,是联结过去与未来、现实与幻想的纽带。阅读是开启温特森灵魂的钥匙,可以给她带来具有安全感的精神空间。列斐伏尔在讨论精神空间时提到,“其他人,以数学家为榜样,建造了一个精神空间”^④。温特森正是通过阅读来建造女性精神空间。

阅读进一步促进了温特森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阅读艾略特的诗歌时,温特森与之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依托诗歌强大的治愈功能,她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温特森在阅读纳博科夫作品时特别难受,感觉文学像是一种背叛,她和其他女性讨论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轻视态度,这是温特森“女性主义意识的开端”。温特森阅读了格特鲁德·斯坦因、安德鲁·马维尔、凯瑟琳·曼斯

菲尔德等人的作品之后,发现男性作家占有的空间如此之多,女性作家却少得可怜,于是她决定要成为一位知名女性作家。温特森强调:“对于一个女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来说,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想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并且相信你足够优秀,那不是傲慢,那是政治。”这些激烈的言辞是温特森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强烈反抗,颠覆父权的潜流在她心中暗涌。尽管温特森是生活在夹缝中的边缘人,可她胸怀抱负,想成为一个观察与想象兼而有之的作家,来摆脱人们对女性作家的偏见。正是阅读给了温特森极大的鼓舞,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激励她通过写作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自我价值。事实上,温特森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知名女性作家。梅里亚·马基宁认为:“到了二十一世纪,温特森作为一位重要而富有挑战性的小说家的地位已经得到了保证。”^⑤

此后,温特森通过写作发出女性被压迫的声音,写作是她经常进行的一种挑战型“空间实践”。苏珊·兰瑟(Susan Lanser)认为,没有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的了,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⑥。温特森通过写作打破了女性沉默的局面,“我相信小说和故事的力量,因为我们用语言说话……我需要文字,因为不幸的家庭是沉默的同谋”。正是通过写作,温特森揭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她拒绝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没有走上结婚生子的道路。她坚持女性身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反对女性身体成为男性利用和驯服的生育机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同性恋文化的里程碑,它“为女性的声音找到了空间”^⑦,这是她通过写作向男权社会发出的挑战。温特森无法接受主流社会所构建的打上性别意识烙印的“空间表征”,她通过自己的知识、话语抵制“空间表征”的渗透和制约。写作是温特森生命的象征,她通过写作发出女性的“声音”,恢复女性发声的权利,她说“我在写作中找到出路”。

温特森对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发起了挑战,她

①王弋璇:《列斐伏尔与福柯在空间维度的思想对话》,《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

②Certeau, Michel D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17.

③毛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罗长利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1页。

④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104.

⑤Makinen, Merja. *The Novels of Jeanette Winters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

⑥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⑦Makinen, Merja. *The Novels of Jeanette Winters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8.

通过“空间实践”换来了发言权,从被边缘化的他者走向了社会中心,突破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空间表征”,完成主体对客体的颠覆,消解父权的声音,构建男女平等对话的“空间表征”,强化女性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通过写作来实现对父权统治的文学反抗。她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来表达对父权社会的反叛,鼓励女性争取更多实现自我的空间,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指出救赎之道,“尽管我们可能是权力产生作用的结果,我们并不是任由权力塑造和摆布的无助对象”^①。

结语

空间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一种产物,是融历史、宗教、性别等诸多要素在内的集合,是代表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象征体系,体现着多维要素的诉求^②。《正常就好,何必快乐》的空间关系表征着父权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关系。温特森对父权社会的抗议体现了女性为争取性别平等的生存空间所做的抗争和努力。小说中描述的教会和学

校权力化的“空间表征”呈现了当代社会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然而,温特森并没有停留于对女性不平等生活的描述,而是进一步阐释了女性反叛父权社会的“空间实践”,意在表明主流社会所构建的“空间表征”束缚不了女性追求自由、实现性别平等的渴望。女性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为女性权益不断抗争的历史,她们拒绝仅仅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也不愿被束缚在传统的妇女角色中。“可以正常的话,你为什么要快乐呢?”养母的这句话体现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妥协,这是社会加诸于女性的道德准则,是女性内化了父权社会“空间表征”的体现。女性不得不遵守父权社会“空间表征”的规范以被接纳为“正常人”,这是对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一种讽刺,温特森揭露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温特森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地位而斗争并构建女性主体性的过程,即是空间体验的过程。这充分展现出温特森独立、自强的一面,她“在新的历史时期表达了对女性生存的思考 and 不同性别思想”^③。

A Spatial Interpretation of Winterson's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WANG Tao-hua & LUO Hai-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Jeanette Winterson's memoir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is a realistic masterpiece reflecting the plight of women's survival with obviou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hy can't Winterson be happy and normal in her life? Spatial interpretation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space" home reproduces the traumatic memory of Winterson's childhood; church and gender education in school represent the discipline and oppression of women imposed by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refore, Winterson carries out the challenging "spatial practice" to break the order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to wake up women's subject consciousness, so as to give a direction for women's redemption.

Key words: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the plight of women's survival; representation spa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spatial practice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J·丹纳赫等:《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②裴莹:《空间美学的理论生成与合法性建构》,《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③杨金才:《关于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